

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

鄧麗嬋

[摘要] 19世紀中後期，中國面臨着技術、經濟與政治現代化轉型，鄭觀應藉助詩歌創作構建、維護政治和商業上的人際關係，並以其理性判斷對社會發展提出建言，創作時政詩評論時局、針砭時弊。他以民族的利益為旨歸，形成禦外侮、振興工商、倡變法等以制度變革為中心的救亡思想體系。民族經濟發展上，鄭觀應以“商律”的變革為中心，注重資本積累與技術提升，力排眾議並超越傳統的道器之辯。隨着現代化的再深入，鄭觀應倡導的以政治為中心的制度變革，其理念進一步暴露了傳統儒家倫理與現代西方思想吸收和兼容的問題。在西學東漸中，鄭觀應呼籲的民族觀、技術資本和政治理念都旨在變革舊有的社會制度，其現代化的努力始終被中國傳統貫穿，以上在《羅浮侍鶴山人詩草》中得到集中體現。

[關鍵詞] 制度變革 時政詩 現代化 鄭觀應 《羅浮侍鶴山人詩草》

近代以降，“啟蒙者—改革家”使命合一業已成為一種常態，乃至成為思想家的內在要求。身兼啟蒙思想家、實業家的鄭觀應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其詩主要見於《羅浮侍鶴山人詩草》，當中明顯與時政有關的詩歌約有129首，佔詩集的46%。^①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上主張“詩言志”，^②“在心為志，發言為詩”，^③講求情感的表達和含蓄蘊藉的旨趣，但《春秋公羊傳》亦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呼聲，^④鄭觀應的時政詩大抵就是“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典型。^⑤相比於李鴻章有限的143首詩，鄭觀應詩歌數量龐大，題材與格調融傳統與現代一體，詩文不輟；^⑥相比於張之洞詩歌維護正統秩序、單一時政主題的論述，^⑦鄭觀應的時政詩確實是近代亟待挖掘的存在。現有的對鄭觀應詩歌的研究主要有兩大類，

作者簡介：鄧麗嬋，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專業博士生。

^① 剔除詩序和他人附和所作之詩，《詩草》共收詩279首，其中對具體時事進行議論的詩歌、涉及時政的應和詩各自約有60首，此處同一標題下創作的多首詩歌視為單一時政事件，僅記為一首，以便統計。參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李氏、王健：《尚書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9。

^③ [漢]毛亨傳；[漢]鄭玄編；[唐]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亨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

^④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679。

^⑤ [唐]白居易；朱金城箋註：《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792。

^⑥ 參見王強：〈李鴻章詩歌研究〉，碩士論文，南京師範大學，2015年，頁7、19。

^⑦ 參見祝伊湄：〈張之洞詩學及詩歌創作研究〉，博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10年，頁142—172。張之洞現存詩有698首，少於鄭觀應，時政詩主要涉及農民起義與外族入侵、南北清流之爭和滿漢新舊之爭三大主題，覆蓋面較少。

一是在其詩學風格、創作觀念上進行文學闡釋，二是以愛國思想為中心，對其詩歌進行總體的歷史內容和現實價值的評析。鄭觀應了然中外情變與時事利病，以超脫於“道器、體用”的抗辯邏輯和文化政治，在其《盛世危言》、《羅浮侍鶴山人詩草》等著作中指出中國的具體需求，促進現代啟蒙思想轉向更開闊且更內在的視角。那麼，鄭觀應的時政詩是如何反映他的以民族最高利益為旨歸、層次豐富之愛國思想？基於國家富強理念之上，他如何看待民族工商業發展中商律的作用，以及技術與資本在國家復興的關係？他呼籲的新政治制度如何與傳統的社會文化制度進行聯繫？此外，他的時政詩與非時政詩又如何互為兩翼、作為詩人心聲表達愛國者鄭觀應的心智？以上問題皆未得到充分解答。鄭觀應的思想絕非是中國現代化成為輕車熟路之後的遲來者，更何況這至今是一個未竟的命題。他對中國自強求富的理性邏輯論辯，反映了其思想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碰撞，因此理解鄭觀應面對西方的衝擊之下倡導對社會的總體結構進行優化的方式是有其必要性的。

一、理解與建構：民族觀念下鄭觀應愛國的三個層次

夏東元認為，根據鄭觀應“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的思想，其愛國主義有三個層次：禦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①該觀點評價中肯，道出鄭觀應的啟蒙邏輯，抵禦外敵是直接目的，振興工商業為手段，並以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為保障。又曰：“變政如彼德，外侮自泯焉。富強從此卜，商戰共籌邊。”他認為，民為國本，財為民天，洋人控制稅收、佔據江海貿易、礦產與鐵路之利益，在詩中得出結論：“恥懼不若人，科制變宜先。議院未能設，輿論須參研。商律宜固定，報律亦當編。”^②在他的分析中，抵禦外侮既是民族救亡的目標之一，也是愛國思想的基礎層次。然而，三個層次並非單線遞進，而是相互纏繞，且鄭觀應十分注重制度上的設立與改良，其思想體系已然呈現了較為複雜的思辨特點。鄭觀應愛國的三個層次始終以民族利益為旨歸，他也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持有民族主義觀念的制度改良先行者之一。^③

鄭觀應所理解的民族層次有三：其一，作為儒家傳統知識分子與商人，對人民大眾被拐販過洋為奴的境遇有所體覺。“況乎青年伉儷破鏡難圓，白髮高堂倚門悵望”，^④文句沉鬱頓挫，深入大眾，有詩為證：“招工來廈汕，滿載如豬畜。……欺吾無領事，弱為強之肉。”^⑤

^①夏東元：〈鄭觀應與中國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識〉，《社會科學》（上海），第11期（1992），頁62—66。另趙璐：〈甲午戰後的《盛世危言》熱與鄭觀應的愛國思想〉，《唐都學刊》（西安），第2期（1995）也持有相似觀點，對夏東元的觀點進行論證與補充。

^②[清]鄭觀應：〈答黃幼農、黃花農、蔡毅若、岑馥莊觀察論時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81。

^③Hao, Yen-P'ing. "Cheng Kuan-Ying: 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1, 1969, pp. 15-22.

^④[清]鄭觀應：〈澳門豬仔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

^⑤[清]鄭觀應：〈南遊有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6。

在太息掩涕之餘，不乏對國民保障的相關制度進行思考。其二，中國中心論之破除。有“同居覆載之中，奚必強分夷夏”之語，^①再有詩歌為證：“南北有定位，東西各輪碾。亞洲與墨洲，足跡相對踐。……如何測以蠡，慎勿窺諸管。”^②鄭觀應通過描述地球的形狀，發出了切忌管中窺豹的告誡。其三，提出中華多民族的相處之道，將滿漢的對立置於與列強的抵抗之後：“普告漢滿人，相依如唇齒，憤志學東鄰，愛國同生死。”^③多民族國家意識在外部衝擊下更為凝聚。^④

鄭觀應迸發自覺的民族意識，表達了對各類現存制度的不滿。他積極瞭解中外軍備，如甲午戰爭前即明白“唯彼（暹羅）國素不准預蓄軍械，鎗礮須購於英法”，^⑤呼籲發展軍備抵禦外敵，其中將才訓練制度又比引入西式兵備更重要，“武備院，韜略館，身非素習拔優列，不能妄把兵符綰”。^⑥又有對中國海關稅務難以把控的感歎：“公理已淪亡，欺侮何偏重。”^⑦太阿倒持，讓這位覺醒的有識之士痛苦萬分。在政治制度變革上，他“翻羨東瀛佳子弟，日新月盛愧吾華”，^⑧也羨慕美國留學生“諸生海外將成曲，底事吳兒換別腔”。^⑨孟德衛認為，中國的外部世界由三部分組成，歐洲則處於最外圍。^⑩而鄭觀應在中國“外部之外圍”世界一探究竟，以歐美法律制度為範本進行反思，如“合力求振興，憲法從斯始”。^⑪他也深知是人才制度已不能適應近代化的需要：“一統好河山，八股人才送。”^⑫又有“自學者驚虛而避實，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率天下而入無用之地”，^⑬由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八股讓天下無人才可用。“講求學校”與“改良政治”等同屬愛國的第三層次，但也與救亡圖存之下的禦外侮息息相關。

這個時期鄭觀應對社會現狀的思考把反封建與反帝國分離，他先進的民族觀念反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對未來中國社會狀態的思考，具體體現在他對泛亞細亞思想不合實際的寄託。鄭觀應與亞細亞協會總領事等有詩歌〈贈日本駐滬小田切總領事論時事歌〉唱和，甲午戰爭後仍然接受協會人士本伊相說的中國現在情形如一線懸危卵之比喻，並以之入詩

^① [清] 鄭觀應：〈論公法〉，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7。

^② [清] 鄭觀應：〈海天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3。

^③ [清] 鄭觀應：〈憤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62。

^④ 以上民族意識參見伍國：〈鄭觀應與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嶺南文史》（廣州），第4期（2005），頁41—44。該文從破除中國中心論、關注華僑與華工、重視民眾的政治參與三方面對鄭觀應的民族國家觀念進行論證。

^⑤ [清] 王彥威纂；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之光緒朝》卷46，民國二十年刊本，頁6b。

^⑥ [清] 鄭觀應：〈兵備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69。

^⑦ [清] 鄭觀應：〈答陳藹庭觀察論稅員〉，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96。

^⑧ [清] 鄭觀應：〈贈美國肄業諸生並容沅浦鄺容階兩教習〉，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5。

^⑨ [清] 鄭觀應：〈贈駐美國副使容純甫觀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6。

^⑩ 參見（美）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江文君、姚霏、丁留寶等譯：《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5。

^⑪ [清] 鄭觀應：〈憤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62。

^⑫ [清] 鄭觀應：〈時文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2。

^⑬ [清] 鄭觀應：〈西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75。

表示贊同，進一步評論“堪羨東瀛能變法，遂令西士服成規。政歸一體無偏護，底事中華習不移”。^①這股思想之風“鼓吹黃白種族對立的泛亞主義，嚴重削弱了中國知識界、紳商界亟待建立和健全的近代國家觀念”，^②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基於對以上觀念的理解，容易構築出毫無根據的理念與對策。對日本制度的親近，反映了鄭觀應民族利益的取向，該意識始終貫徹到他的啟蒙邏輯與制度變革的呼籲中。

二、蓄積與突破：鄭觀應技術資本觀的應用與局限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現代化源於一個叫做“除魅”（disenchantment）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和技術知識取代了宗教和非理性知識”。^③理性與邏輯思辨是現代知識分子重要的思維特點，最能體現鄭觀應思維的當屬“商戰”思想，他認為“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為無形之戰。一法泰西，講武備以圖強，為有形之戰。知己知彼，戰守無虞，自然國富兵強”。^④他的商戰思想涵蓋中國的國防安全、對外政策以及商業制度的改革。而商戰在制度變革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商律中。

其一，改良工商業的制度，強調“商律”在愛國思想層次的重要性。“其二農工商，振興有法度”，^⑤而商律的制定和愛國的第一層次禦外侮是息息相關的：“朝廷近頗重商農，裕民、富國、振困窮。不頒商律嚴賞罰，外侮頻來，難折衝。觀時勢已岌岌。兵學治學宜亟立培養多掄文武才。”^⑥可見禦外侮和振興工商兩層思想是並行交融的。其二，維護並按照商律管理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股東大會中，依託“商辦章程，悉遵商律”的原則，^⑦在粵港澳各股商及其委託代表見證下，辦理股商交卸事宜。

振興工商業作為重要的禦外侮手段，鄭觀應尤為強調技術與資本進步與蓄積。鄭觀應深知生產技術的重要性：“製造需機器，借材異域多。不知優與劣，糜費更蹉跎。”^⑧承受着盛宣懷的“斂字訣”壓力下，堅持對招商局添置新船的要求一次次進行申訴，以維護競爭力，具有同時代人少有的遠見。^⑨其詩有云：“機器求新巧，討論日孜孜……日新而月異，百物足自資。人材從此出，習俗可轉移。工商日益旺，府庫餘度支。器不向外購，尤能塞漏卮。”^⑩

^① [清]鄭觀應：〈時事感懷〉，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10。

^②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548。

^③ (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黃彥傑譯：〈引論〉，《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1。

^④ [清]鄭觀應：〈商戰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97。

^⑤ [清]鄭觀應：〈海禁宏開利權外溢甲午以後事變日亟盛杏蓀京卿關心時局因賦長歌借相質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00。

^⑥ 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57。

^⑦ 〈輪船招商局股東大會紀事〉，《申報》（上海），1909年8月16日，頁3，版2。

^⑧ [清]鄭觀應：〈漢陽差次得滬友書賦此志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98。

^⑨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23。類似事件再有鄭觀應以獨立商辦精神贏得津滬電報的永久承辦權，而且獲得各條新線的專辦權。成果頗豐，不再一一列舉。總體而言，其近代的資本主義商人精神是昂揚奮發的。

^⑩ [清]鄭觀應：〈水陸師學堂各藝大書院博物會及機器製造廠棲流工作所皆富強始基急宜振辦賦此志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7。

該詩直接把機器技術、人才培養、工商發展、經濟安全並舉，《盛世危言》中又提及：“獨有商務之盛衰，不獨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①足見鄭觀應的洞見。

然而，知易卻也行難。鄭觀應知曉“總辦既非任，工師才亦輕”，^②掌握工藝的西洋匠人對技術進步具有重要作用，“洋匠挾制多紛更，總辦無權費經營”。^③在提及礦務業時，“（皖南之礦）又擬僱洋匠前來打鑽，爾欲華洋合辦”。^④在上海機器織布局章程中亦有提及對西洋匠人的重視和對技術的鑽研，“領袖工作宜屬洋匠督教也。事經開創，必賴師承”。^⑤但仍在織布局的人員培訓上，過於依賴洋匠丹科，並未做任何擴大生產規模的技工培訓，因此處於全局務利鈍繫於一人的被動局面。^⑥該技術問題甚至進一步影響到資金問題，“在上海創辦織造洋布局，因人事不齊，日久未能成功”。^⑦鄭觀應的確忽略了織布局技術與生產的緊要聯繫，加之同時期社會集股困難，^⑧造成舉步維艱的局面。

鄭觀應對資本的蓄積與再生產具有明確意識。他初入寶順洋行，憑藉強烈的競爭意識抓住一切獲利機會，在貿易條件不明朗的情況下“打通關節”，“在上海洋行中率先打開了東洋口岸”，並且在艱難的條件下，克服急流險灘開闢的“上海—漢口航線”，^⑨憑藉近代商人的精神與其商業判斷進行資本的積累。盛宣懷評“喜兵事，好奇計，尤精於白圭計然家言”，^⑩資本是技術引進的基礎和關鍵，若資本不足則成掣肘，“器成價不資，弊竇難言宣”。^⑪既是冒險，也有失策之處，如在1883—1884年的經濟風潮中，鄭觀應由於挪用資金進行股票投機，導致織布局的損失。^⑫

除卻投機及偶然原因，資金管理和資本積累的確存在主客觀等諸多問題，以下主要以機器織布局、輪船招商局等機構為例進行分析。其一，資金未得到科學管理與合理使用。購置機器花費大量資金，“外國所需多購自專造者，宜早購定備用”，^⑬如機器織布局的記錄中，原計劃吸收40萬兩投資，鄭觀應招合股分銀50萬兩，實收35.28萬兩，用其中20.9萬兩購

^① [清]鄭觀應：〈商戰〉，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88。

^② [清]鄭觀應：〈莫若篇〉，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05。

^③ [清]鄭觀應：〈鐵廠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03。

^④ 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56。

^⑤ 中國史學會編：〈紡織製造編〉，《洋務運動》第7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472。

^⑥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98。

^⑦ 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16。該選段出自〈彭汝琮致鄭觀應函之一〉，函件雖未指明因何人事原因而誤工，但函件時間為光緒七年九月八日（1881年10月30日），與以上易惠莉《鄭觀應評傳》記載丹科出洋的時間“光緒七年九月底”符合，因此彭汝琮應是針對丹科出洋之事進行評論。

^⑧ 參見〈上海機器織布局啟事〉，《申報》（上海），1881年4月30日，版4。

^⑨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2。

^⑩ [清]鄭觀應：〈盛宣懷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41。

^⑪ [清]鄭觀應：〈莫若篇〉，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05。

^⑫ 參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14—356。鄭觀應於此次經濟危機未及時挽救市場，獨立商人地位有所撼動，經濟、政治和商業能力和信用下跌。

^⑬ [清]鄭觀應：〈鄭官應致盛宣懷函〉，朱子恩等編：《盛宣懷檔案資料：漢冶萍公司（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200。

置機器，但後文又言及購存機器等項“由上海縣核實勘估，共值銀十二萬餘兩”。^①在投資目標未能完成的情況下，用超過三分之二的銀兩購置機器，資金層層耗盡，經收股本後並未開辦已先虧折。其二，企業融資困難，資金短缺。有記錄可證“今老股加價無多，新股驟難招集，而建造房屋、找付機器價值、添購軋機、電燈等費，需費不貲”。^②另輪船招商局也面臨相似困境：“招商局生意大壞，本年竟致虧本六、七十萬之多……股票已落至一百二十兩，尚無人願受。”^③其三，官督商辦下體制僵化，資金為政府挪作他用。如在1883年鄭觀應呈交李鴻章的文件中因朝鮮借款“暫挪公款應急”，^④專管官務的龔壽圖儘管在資本選擇上“均無干涉之情形也”，但他卻被評價為“假稱虧折，蓄意誑騙為案中最要關鍵”。^⑤在商人階層的確有對一味官氣、不諳商情的嫌惡，更有“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方能持久”的呼聲。^⑥

此外，傳統的義利觀也困擾着鄭觀應，“羞言阿堵物，莫逞孔方豪”，^⑦“傳統的商人道德倫理，倡導有悖於近代資本主義商業精神的對財富的虛無消極態度”，^⑧這一點在他的詩歌也有體現“身心猶是幻，富貴亦何娛”，^⑨“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⑩對商業利潤的虛無態度阻礙了他的近代商人意識發展。但無論如何，對技術和資本的蓄積體現了近代商人的自覺意識。

鄭觀應在看待傳統與現代的觀念上亦有寶貴的突破。其一，鄭觀應抵抗大眾對現代化的非議，並將成果帶入民生領域。“然國人對於郵政亦未嘗無非議之人也……如鐵路，所曹[遭]掎擊之甚，而以夙有成見”，對鐵路、郵政、鐵礦等頗有微詞，僅有“其餘談新政者如鄭官應之屬咸津津樂道”。^⑪下層民眾如此，精英對近代技術也偶有排斥現象，朝鮮詩人姜瑋與鄭觀應有交往，他前往中國學習先進的技術與近代化成果，在漢陽鐵廠四十餘日，曰：“舊苦風火之崇，遇夜輒甌。”^⑫此後恐連累朋友，告辭回國。無論是社交辭令抑或對新興技術

^①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7冊“紡織製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450—451。根據記錄：實收35.28萬兩，其中20.9萬兩購置機器，14.3萬兩用於放出或者押股票，並無實銀存局。數目還差約800兩，暫未提及去向。

^②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7冊“紡織製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452。

^③吳倫霓霞、王爾敏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頁117。

^④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68。

^⑤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7冊“紡織製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450—452。

^⑥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7冊“紡織製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469頁。

^⑦[清]鄭觀應：〈世欲希道德而又不能忘情於酒色財氣故作四箴以自警兼勉同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419。

^⑧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75。

^⑨[清]鄭觀應：〈自遣〉，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72。

^⑩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279。

^⑪楊鍾義纂修：〈交通六：郵政〉，《奉天通志》卷166，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頁2b。

^⑫(朝)姜瑋：〈遠遊艸〉，《古歡堂收艸》卷16，1889年活字本，第7頁。原文為“風火之崇”，應為印刷之誤，此改“崇”為“祟”，“風火之祟”涉及理學對人魂魄、生死的解釋，此處應指姜瑋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擔憂。

心存疑慮，對鐵廠的恐懼確實存在。如此對比，鄭觀應實難能可貴，可稱得上是“精驚八極，目營四海”，^①有着近代資本主義商人的頭腦與傳統儒生的兼濟天下之抱負。

其二，他的道器觀將技術與資本進行理性與綜合的看待。〈跋〉以儒家思想為技術之本，“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窺杞憂生之意，尤在睦鄰禦侮。夫樹國威，尊國體，必先由自強始”。^②《盛世危言》首篇〈道器〉批判“西人不知大道，囿於一偏”。^③儘管以涇渭分明的道器觀結尾，但他實際上“刻意把‘體’的範圍縮小，將‘用’的面向拓展，甚至把政教法度、開議院、整飭吏治都納為‘用’的範疇”，時人評價“更質言之，則非資本問題，而政治問題也。嗚呼，我政府何以待之，我國民何以待之”。^④鄭觀應符合進步的歷史潮流，基於工商業的要求，繼而生發對政治制度的變革願景。

三、生發與流轉：鄭觀應以儒學傳統為基礎的政治訴求

單純運用技術和資金並不能達到禦侮取勝的目的，在近代中國只有建立和新興工商業相協調的民主政治才能促進經濟發展，鄭觀應有詩為證：“財政暗侵開礦路，利權顯奪踞關津。急求立憲開民智，上下同心撫字仁。”^⑤如果把“現代”定為民主、經濟發展、科學方法及其技術三個要素，其中民主“與人類對自由的需要相吻合……在本質上是一項關於‘合意的服從’（Calculated Obedience）的政治制度”，^⑥同理，鄭觀應對議會制與立憲制的提出是基於個人政治素養的選擇，他堅信民主是最佳選擇，除了西方的大勢所趨外，還因為清政府面臨的統治危機，承前所論，立憲立法總是與民族存亡相互聯繫的。

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安身於傳統的儒家社會，此中首先是生發之關係。鄭觀應倡導的政治制度主張，闡述上多從儒學生發，為新興的社會各項制度正名。“人說泰西法，我說出孔孟”。^⑦傳統上內儒外法的觀念，此處的“法”本質上還是“人治”。鄭觀應迂迴倡導變“人治”、“刑治”為“法治”，議會制一旦確立，可保證中國脫離政治之舉息牽於一人的境地。但正名中無可避免出現矛盾，大衛·萊昂（David Lyon）認為“現代性……是緊隨着啟蒙運動後出現的社會秩序。現代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進取動力、對傳統的背離拒斥以及全球性後果為標誌”，^⑧其與傳統的背離是必然的，鄭觀應對政治制度的批判也集中於對僵化之科舉制度的抨擊：“吾華惟泥古，八股為儒珍。”^⑨反觀日本因積貧積弱後痛定思痛，主動招攬勤勉

^①本為李鴻章誇讚張佩綸之語，此處借用為評價鄭觀應，參閱[清]李鴻章：〈致張佩綸〉，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3） 信函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17。

^②[清]鄭觀應：〈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67。

^③[清]鄭觀應：〈道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42。

^④上海時報館編評：《粵漢鐵路交涉秘密檔案》，上海：上海時報館，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五日初版，頁104。

^⑤[清]鄭觀應：〈乙未感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60。

^⑥（丹）戴維·格雷斯（David Gress）；黃素華、梅子滿譯：《西方的敵與我：從柏拉圖到北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478。

^⑦[清]鄭觀應：〈答汪甘卿孝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55。

^⑧（加）大衛·萊昂（David Lyon）；郭為桂譯：《後現代性》，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6。

^⑨[清]鄭觀應：〈中日變法志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74。

子弟遠赴西方學習，而中國士人所學非所用，強弱就由此區分開來。科舉制度本身也有其他缺陷，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有着過分的學緣關係，“陳陳相剽襲，昏昏如說夢。科場流弊多，師弟交誼重”，^①師門與團派之間相互提攜，後來人才無法居上。

然而，新興的政治制度又流轉於傳統儒家文化之中。此處“流轉”借鑑杜贊奇的定義，他認為歷史上的觀念和實踐如果在穿越洲際的過程中歷經各種變形，仍然可以保留着與其源頭可以識別的聯繫，而且還以一種更豐富且更適用於一個新時代的形式回到原來的國家，則為流轉。^②儘管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並非來自中國，但在進入中國後的確與儒學發生關係，接受儒學為其存在和推廣正名。杜贊奇“跨洲”、“變形”、“聯繫”等關鍵詞是以流轉切入的闡釋點：資本主義確實跨洲而來，接受儒家思想後本土化，但與原國家的政治精神是一致的，只不過本土的制度建立條件尚未成熟。根據杜贊奇的看法，“大寫文化”（culture with a Capital C）包括民族長久的習性、宗教和傳統文化，“小寫文化”（culture with a Lowercase C）為人們對外來的事件、做法、習慣和制度等賦予意義和重要性。如果以該理論理解鄭觀應所在社會的文化活動，則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思想是中國固有的“大寫文化”，而鄭觀應嚮往的政治制度則為“小寫文化”，但也最終被儒學等傳統文化所清算：“儒家漫說無因果，報應分明有早遲。”^③的確符合杜贊奇所說的“這種文化週期性派生出淨化運動，力圖回到作為建制的或者反建制的意識形態那種真正的價值和能力”。^④承前所述，強大的儒學傳統通過壓制新興的政治制度的意義，清洗着新傳入的政治制度的話語結構和意義，使得立憲與議會屢屢受挫。與杜贊奇預測的不同的是，小寫文化並未能如此順利成為大寫文化的一部分，鄭觀應詩云“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華商因此不及人，為叢驅爵成怨府”，^⑤他認為政府不聽輿情，開銷巨大，官員學非所用，導致會辦招商局遇到挫折，即因中國喪失了利權，民族資本主義難以發展；又有封建官員的抽成與阻撓，因此發展工商業等小寫文化的意義被抹除了。

現代性主要“抽象出現代化過程的本質特徵，着眼於從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上把握現代化社會的屬性，反思‘現代’的時代意識與精神”。^⑥對於鄭觀應而言，“果能設立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⑦他認為商戰為富，變革政治制度為強，這是民族救亡的兩翼。但礙於當時社會環境，他也曾經動搖過呼籲變法的決心——“合群立憲維新本，獨守成規創業微”，在收入《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時，改為“文期豹

^① [清]鄭觀應：〈時文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2。

^②（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黃彥傑譯：《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67。

^③ [清]鄭觀應：〈時文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467。

^④（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黃彥傑譯：《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125。

^⑤ [清]鄭觀應：〈商務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70。

^⑥ 陳嘉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7。

^⑦ [清]鄭觀應：〈議院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13。

變難占吉，道盡狼當早見微”，^①後者在艱難世道面前表現出不確定之感。有學者認為，呼號“政體強身”並追求富強，但議院制度終究是移植的，終究只能水土不服。^②鄭觀應早年接受的仍然是應試科舉的傳統教育，他在對生發與流轉着的政治制度的引入過程中，完成了制度在不同文化中意義轉換的思考。“法的精神不太能夠反映民族文化，但是能夠反映特定的法律文化”。^③在倡議院與呼籲立憲的過程中，他認識到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相互配合，儘管在詩歌中偶爾體現出他的不得志，但在辛亥革命後卻切實參與到新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建設當中。

鄭觀應呼籲變法圖強已不容易，但他仍然秉持思想的現代性。光緒二十年，鄭觀應曾將孫中山引為“富強說”的同道人，還極力轉請盛宣懷向李鴻章推薦孫中山，“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④時至民國，雖未對辛亥革命表現明顯支持——僅在民國元年刊印的〈西行日記〉作出過客觀的描述，“既遭灘河之險，復受烽火之驚”，^⑤繼續思考目前的經濟形勢和相關商戰對策，隱約表達了對民國政府的現代化措施，期望“人心均盼早日改革，地方安靖，貨物流通”，^⑥鄭觀應的民族主義思想甚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提出。^⑦客觀來說，鄭觀應在其時代可謂是高瞻遠矚。

四、鄭觀應對現代化的推動與困境

鄭觀應的愛國思想以民族利益為旨歸，禦外侮與救亡圖存為直接目的，以倡導商律為前提、注重技術和資本的進步和積累的工商業發展是核心與手段，並呼籲變革政治制度以適應、維護既有的現代化成果，三層次的關鍵在於軍事將才、工商業和政治等領域制度的革新。鄭觀應的思想體現了啟蒙思想家理性的邏輯與闡釋，他正是深知近代中國的國內外環境，才由表及裡、逆推正設：實際上應是政治制度保障工商業發展，軍事、技術、資本才得以生存，民族利益得以維護。他的思想以民族為旨歸，但也急於求成，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失之準確。^⑧他的愛國思想富有層次與厚度，在《盛世危言》提出整

^①[清]鄭觀應：〈花甲初度感懷兩律承親朋賜和賦謝〉，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68。改句參閱同頁的注釋二。鄭觀應後期思想在政治上並非表現出一致地否定，他在〈感時即事上盛杏蓀太常〉（書籍出處同，頁1326）中原句為“奇材膺重聘”，於1909年改為“憲法宜早立”，經歷過甲午中日戰爭、廢除科舉制等重大事件後，仍在不停自省、自我更新。

^②王杰：〈西學中解 潮頭風範——論鄭觀應《盛世危言》對近代中國的啟導〉，《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5年第3期，頁173—179。

^③（美）彼得·A·霍爾（Peter A. Hall）等；王新榮譯：《資本主義的多樣性：比較優勢的制度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65。

^④中山市人民政府：《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47。鄭觀應早年與孫中山有舉薦關係，儘管鄭氏未公開對辛亥革命作出過多評論，但能體現其對孫中山其人與主張的部分認同，對革命表示相對的傾向性。

^⑤[清]鄭觀應：〈西行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026。

^⑥[清]鄭觀應：〈西行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030。

^⑦Chong, Key Ray. “Cheng Kuan-ying(1841-1920): A Source of Sun Yat-sen’s Nationalist Ide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8, no. 2, 1969, pp. 247-267.

^⑧參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36—443。鄭觀應前期因英國對華工的同情等事件而對國際公法抱有幻想；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儘管對日本擴張表現出警惕，但是對防止日本完全缺乏必要的外交對策構想。

套現代化的措施且始終躬行，不可不謂振聾發聵。此外，眾多學者認為鄭觀應囿於傳統倫理，使思維有所局限，無法更進一步地推動現代化的進程。事實上，現代化本身就有天然地帶有批判性的比對。英國社會學家庫馬（Krishan Kumar）認為，現代性是中世紀的發明，之前的世界籠罩在黑暗之中，被想像為異端。^①當學者以“現代”概念對近現代社會批評時，對傳統儒家已有先在的否定，因此對傳統的批評是否公允也值得商榷。

至於鄭觀應倡導制度變革的原因，他作為非官方的改革家，可以提出更靈活的制度變革措施，將西方思想實在地融入中國的體制中，希冀藉助制度去約束社會和當權者，去建立新規則。米歇爾·馬斯特羅尼（Michele Mastroeni）提出“工具性制度”和“決定性制度”的概念，前者是指快速變動、解決特定領域問題的制度，後者則是構成社會義務並制約人們作出選擇的社會規範。^②如藉助以上分類理解，鄭觀應基於禦外侮、振興工商的制度多屬於工具性制度，在鬆散耦合的軍工、商業等領域，制度變革與法律的轉移更容易實現，短期內確能起到“富國強兵”之效用。但以上制度不可避免有濃重的政治性，又需政治領域的制度變革來保障，政治的制度變革必以約束性協議的姿態，與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進程中緊密結合時，變革的阻力則很大了。鄭觀應並非官方變革者，還身處“具有寄生性質的買辦階層，且因偏離為帝國服務的社會要求而受到批評”，^③其中儒學思想緊緊纏繞在決定性制度之中，鄭觀應的近代思想因此無法更深一步，對傳統稍微偏離則動輒受到掣肘。鄭觀應另闢蹊徑，發奮著書並建言立說，儘管無法動搖內裏的運行，但以相關著作針砭時弊，其現代思想掙脫傳統的唯倫理性，勇於衝破地方習俗和實踐的限制，具有深刻的現代性，開啟了社會變遷的可能。

在鄭觀應的時政詩之外，“非時政詩”也作為其愛國與現代化的一部分而存在，主題主要有二：應和交際與隨記抒懷，前者構建鄭觀應所需的政治與經濟的社交活動圈，他在經濟上與盛宣懷有緊密聯繫，^④如 1896 年鄭觀應就招商局職務、漢陽鐵廠焦炭和人才、速辦銀行等問題多次致函盛宣懷。^⑤文集中與盛宣懷有關的作品有文 68 篇、詩 6 首、詩序 1 篇，鄭觀應或許視盛為同一階層的合作夥伴，應和詩數量較少。^⑥政治上與王之春、鄧華熙、彭玉麟

^① Kumar, Krishan. *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 New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91.

^② (英) 米歇爾·馬斯特羅尼 (Michele Mastroeni)；林芳芳譯：〈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演化：考察制度變革的雙層方法〉，周豔輝主編：《當代資本主義多樣性與制度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頁 74—75。

^③ Hao, Yen-P'ing. "Cheng Kuan-Ying: 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1, 1969, pp. 15-22.

^④ 《詩草》收錄未涉及時評的應和詩約 57 首，如〈贈李次青方伯時同在海南軍次〉；隨記抒懷類有 63 首，如〈秋夜即事〉。出處為《鄭觀應集》，文集版本與數據計算方式同前言部分。邵建《一個上海香山的人際交往——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年，頁 11），書中提及官場核心人物為王之春和鄧華熙，但就應和詩數量而言，與彭玉麟的詩歌交流更多。

^⑤ 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45—474。

^⑥ 此為以“盛”為關鍵詞在《鄭觀應集》檢索出包括但不限於以盛杏蓀、盛宮保、盛宗丞等稱呼為題的詩文。統計過程中如有若干首詩歌同題，則分別細化至具體數目以便突出鄭觀應對人脈維護的區分與重視。統計王之春、鄧華熙和彭玉麟相關數據的方法同。其中一首題名為〈上盛杏蓀太常〉在己酉本改“上”為“贈”，視盛為同階層者，可窺鄭觀應交友心跡。

交往密切，關於王之春有文 14 篇，詩 13 首；鄧華熙有文 9 篇，詩 4 首，詩序 1 篇；而關於彭玉麟則有文 16 篇，詩 37 首。以上非時政詩包括但不限於讚美他人功績、向上建言、婚喪嫁娶、題詩唱和等主題，形成鄭觀應完善的社交詩歌系統。因詩歌的交往意味着階層的接觸與跨越，可看到結交的人官階較高時，應和詩數量更多，如鄭觀應就彭玉麟的同一詩韻創作 24 首詩歌，而對於盛宣懷等同級合作夥伴，詩歌數量則較少。再者，鄭觀應以詩為媒取得人格上的平等，少卻攀附之嫌疑，如此步步為營，推進制度改革與中國的現代化。

鄭觀應在其〈待鶴山人詩集自序〉中提到：“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直記時事，不避嫌怨，不拘格調，既不取法古人，又無入神之句，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救國苦心婦孺皆知。”^①的確如此，若以中國古典詩學之要求，其詩歌未免過於直白、失其含蓄蘊藉之雅趣，然而經世致用的鄭觀應卻完成了啟蒙的突圍。《盛世危言》等以文章道出對世道的思考，〈莫若篇〉等時政詩表達出他對現實的關懷，在風雨飄搖的清末，“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②不也正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

^① [清] 鄭觀應：〈待鶴山人詩集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47。

^② [唐] 白居易；朱金城箋註：《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2792。